

友

贾植芳

暮年杂笔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丛

文丛

贾植芳

暮年杂笔

倪墨炎 主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文

丛

(沪)新登字118号

责任编辑 阮智富
装帧设计 陶雪华

暮年杂笔

贾植芳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200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18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32-0256-5 / I · 54

定价：14.50元

总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于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

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膀,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编

1996年夏于沪西

前记

八十年代前后，我国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我终于告别了二十多年的囚禁与劳役生活，回到了人间，完成了又一次由鬼变成人的历史手续，这时我早已过了耳顺之年，踏上人生旅途的最后一个驿程了。真所谓本性难移，积习难改，这时我又拿起了废置多年的笔。而在 1955 年大祸从天而降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只能用它写交代材料与所谓“思想汇报”，那是一种劳役而不是写作。这本小书里收辑的各色小文章，就是我这十多年写的各类小文章的一个选本。它里面说了些什么，书里都有明确的交代。可以总括地说一句的是，如果我青年时代的创作表现（小说、散文等）反映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时代观感与历史追求，这些我写于垂暮之年的杂色文章（包括也写于晚期的生活回忆录《狱里狱外》），则反映了我的人生体验和对历史的沉思与展望。

记得 1948 年深秋，我从关押了经年的国民党中统特务监狱出来后，为了筹措路费离开我不能立足的上海，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仓促间从图书馆查找出了我从三十年代到 1947 年被捕前写的十多篇短文章，我题名为《热力》，交给我熟悉的一家出版社印行，因为那时我才三十多岁，正值人生的壮年时期，那也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而眼下编选这本我经历了又一次大难之后所写

2 前记

的这类各式短文时，我已是一个年逾八十的老朽了，所以我题名为《暮年杂笔》。据说，性格就是命运，但个人的命运又总是受着社会政治历史播弄的，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我相信这个生活真理。

九十年代初，乃修曾为我编了个序跋集，我命名为《劫后文存》，但从此以后，我又写了不少这类文字，这里选用了几篇，作为这本小书的一个构成部分。它们也类同于这本小书中的第一部分《故人旧事》，因为它们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我与友朋之间的交游活动。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老”在中国也是一种资本。我多年混迹于文场，又执教于学府，这仿佛是一个营业执照似的，应邀为各类著译写序，好像又成了我的一个专业，去年南方的某刊物上，就曾抬举我为“写序专业户”。我在苦笑之余，又觉得自己真像是旧社会在邮局门口摆个小桌子以代人书写家书和状子谋生的潦倒江湖的落魄书生。顾炎武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写序。”我就得了这个不治之症。1989年前后，我在乃修编的那本序跋集《劫后文存》的《前记》中说：“……但大半是为中青年两代人著译写的序文，目的是起个广告作用。用商业语言说，是为了‘以广招徕’，因为这年头，严肃的文艺著译与学术著作，出书尤其不易，为了对他们的劳动成果给以应有的品评，把他们推向学术文化界，我应义不容辞地为他们的破土而出摇旗呐喊。”这就是我的自我交代。但现在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营生，就只好宣告憩业了。

炳辉在繁重的教课之余，费时费力地为我编选了这本小书，近年结交的文友倪墨炎兄又大度地将它收入他所主持的《书友文丛》。这些盛情厚谊，使我又一次体会到“在外靠朋友”这句旧话的历久弥新的意义；也又一次使我尝到了“以文会友”的甜头。

这可说是我步入晚境以后又一大精神收获。我真得谢谢他们！顺便也谢谢这多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上帮助和照应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话就说到这里。

贾植芳

1996年7月下旬，上海寓所。

目 录

前记	(1)
· 故人旧事 ·	
怀念丸善书店	(3)
记胡风的一首悼念鲁迅的诗	(11)
记还珠楼主	(14)
我的老乡王瑶先生	(20)
忆覃子豪	(26)
我与胡风同志相濡以沫的情谊	(41)
悼念陈仁炳先生	(56)
悼日本友人相浦呆教授	(62)
萧军印象	(67)
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	(72)
胡风的《酒醉花簇——忆贾植芳》诗	(76)
纪念我的朋友卢杨(克绪)先生	(80)
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	(85)
· 自画像 ·	
我的第一篇小说	(95)
遗失的原稿	(99)
且说说我自己	(103)
我的读书记	(109)

我的戏剧观	(115)
我话老年	(119)
我的称谓忆旧	(122)
世纪印象——一个老年人的自述	(126)
· 随笔与杂感 ·	
温故而知新	(133)
笔颂	(136)
花与鸟	(138)
中外所见略同又不可同论	(142)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45)
由两个小男孩想到的	(147)
上海是一个海	(150)
关于读书	(153)
一个老读者的祝贺	(156)
刚强之美——看杨海伦画展	(160)
曲阜行	(162)
· 讲演录 ·	
我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167)
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	(173)
· 序和跋 ·	
《三国演义》新版序	(193)
《劫后文存》前记	(197)
《山西文学史》序	(199)
《中国文学史料学》序	(203)
《天声人语——日本散文选》序	(206)
《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序	(210)
《历代名家尺牍新钞》序	(215)

《勃留索夫日记钞前记》之后记	(219)
《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序	(221)
《人道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序	(223)
《郁达夫研究》中译本序	(225)
《城市情感》序	(228)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	(232)
《20世纪学者散文百家》序	(238)
探索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前途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序	(242)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序	(247)
《艺术的失落》序	(250)
《中华对联大典》序	(253)
《姑苏书简》序	(257)
《狱里狱外》自序	(261)
《洋教士看中国朝廷》译序	(263)
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译本序	(268)
《人之子——耶稣传》中译本序	(273)
《巴金的世界》序	(276)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晓风著《胡风传》序	(280)
编后记	(284)

故人旧事

怀念丸善书店

大约在 1942 年，也就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那时，我蛰居在西北一个荒漠的城市里，像一只鼠子似的生活着。一天，读到当地报纸上一则简要的消息说，开设在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已宣告憩业；并介绍说，该店创立有年，为亚洲最具规模的经售外文书籍的书店云云。当时读到这则消息以后，我的心不禁紧缩了起来，好像不意之间听到一个友人逝世的噩耗似的，我有几天很不好过，恍然如有所失，但更主要的是，我感到了不可遏制的愤怒，同时又感到这也本是意料之内的事，不足为异：正在疯狂地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像古往今来的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逆天行事，干的既然是些见不得天日的黑暗行径，就必然发展到仇恨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智慧的书籍，以毁灭文化来自安自慰，妄图用愚昧来维持自己的残暴统治，正像人们需要书籍来开发自己的精神世界，增进自己的智慧营养那样。当时，我很想濡笔伸纸写点什么，来抒发我的愤懑之情，但我当时的处境，也和处在日本军阀铁蹄之下的日本人民差不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中国也是大夜弥天的黑暗日子，人们像置身在密封的罐头里，被剥夺了正常的呼吸自由。……

这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我每每碰到来访的日本友人，总爱向他们打听丸善书店的情况。他们总是平平常常地回答我说：

“丸善嘛，开设在东京日本桥一带，经营外国书籍。”他们并不能从我的问话口气里听出弦外之音来，还认为我是打听它的地址呢。这也难怪，他们大多年事较轻，当了教授的也不过四十左右的人，并不了然历史上的情况，因为军国主义统治日本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而那时他们还在童蒙时代，甚至还没有出生。但我听了这些内容一律的回答以后，心里又不禁为这家书店在战后得以重生，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之所以对这家书店怀有长远的感情，念念不能相忘，是因为在我青年时代的学习道路上，在我的建设自己的知识工程的过程中，它是我的一个良朋益友；那时，我每和它接触，总像翻开一本新书时似的感到暖意喜人。因此，虽然和它的交往已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而我对它的记忆和怀念，却历久弥新，难以忘怀。

我知道丸善书店，大约是在 1934 年，那时我在北平当学生，因为置身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已能稍事涉猎外国文学书籍了。那时，北平东安市场有几家旧外文书店，成为我时常出入之所，听说，它们卖的外文书都是从日本的丸善书店批来的廉价书。我的哥哥贾芝和他的同学朱颜（锡侯）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读书，那时已和东京的丸善书店有邮购关系了。据说，这家书店为读者服务的工作真是作到了家。你只要投函给他们，写明你的专业和爱好（我指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学一类），他们就会随时向你提供有关部类的新书讯息。遇有一批廉价书出售，他们会不失时宜地把书单寄给你，听凭你挑选，而无论是你需要购置的新版书或廉价书，你只要把书目寄给他们，他们会很快地照单把书寄来，你如翻看后决意买了，然后再把书款汇寄他们，如果看后不中意，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书退还给他们，邮资也概由他们支付。他们像相信自己那样地相信读者。他们经营的书籍

语种，除俄文及中文外，世界各种文字的出版物可说搜罗齐全，应有尽有；如果他们书目上未收入的书类，你托他们代购，它也能及时向原出版地代为购置，决不失信。我哥哥贾芝和他的同学，后来也是我的朋友的朱颜，他们的英、法文藏书，就大都是通过从丸善邮购这个途径积累起来的。后来我到了日本，不久，朱颜也去了法国，我替哥哥在丸善买书，差不多成了家常便饭了。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我这个一贯不安分的学生，旋即被地方公安机关“逮捕归案”，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开始用他们的专政机器来“教训”我了。到了翌年春天，由家庭花钱托人，费死费活地把我保释了出来，因为还留着一条“随传随到”的尾巴，我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查考起来，中国从清末维新运动失败，康梁逃捕东渡以来，日本因和中国是一衣带水之隔，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逋逃薮，以迄于1937年抗战军兴。正像十月革命前的历代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以西欧为逋逃薮那样。我那时是个还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也只好踏上前人的足迹。我哥哥托他学院的一个教授，在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弄到一张入境签证，我以逃亡兼留学的身份，买舟东渡，孑然一身地到了日本；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初次尝到了去国的悲哀。

1936年初夏，我到了东京，因为学过点日文，所以一边进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继续学日文，一边考进日本大学社会科。从这时起，坐落在东京日本桥的丸善书店就成了我时时涉足之地。这是个驰名亚洲的外文书店，它所经营的外文书籍种类繁多，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它大大打开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见识。由于年深月久，我已不复能记忆它的布局格式。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买卖场所，倒像一个研究单位的书库。它那幢三层的红色建筑物和耸立在大门口两旁的纯白的维纳斯塑像，却仍然色彩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好像还在眼前一样。近阅周作人写于四十年代

的《瓜豆集》，那里有一篇记叙丸善的文章，对丸善的历史和规模论述得甚为详尽，好像是一篇为丸善书店写的碑文。但我在日本居留的不到两年的时日里，在和丸善的来往中，有几件事却值得写在这里，以志不忘。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为了繁荣我们的文化事业，改善书籍流通供应的渠道，打破新华书店独家经营的过度集中局面，各地陆续开设了不少民营书店，为解决读者买书难的问题，提供了不少方便。我这里记述的有关丸善书店对读者服务的故事，大约还不算明日黄花，值得作为参考。

这里我说的几件事，都是国内亲人或友人托我在丸善买书时的经历或故事。

我的哥哥那时初学德文，写信要我买一本斯托姆的小说《茵梦湖》，作为自学教材之用。我跑到丸善的德文部，说明作者和书名后，店员立即在书架上给我抽出一本厚沉沉的，装璜精美的《茵梦湖》。我接书后，正在掏钱包要付钱时，这个店员对于我这个穿一身黑色大学生制服的学生，忽然发问说：“你买它作什么用？”大约因为这是一本普通的小说，他看我的服装年龄，绝不像个收藏家，所以才这么发问的。我说，是替朋友买的。他又颇感兴趣地问到托我买书的人的德文程度，以及他是否也是个学生，等等。我说，正是，他和我一样，是个学生，他是把这本书当做初学德文的教材用的。他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你犯不着买这么讲究的版本，花钱多，用起来不方便，有一本定价低廉的文库本就满可以了。”说着，他收回原书，去另一个架子上抽出一本用普通纸张印的三十六开的平装文库本，递给我说：“那种版本要十多块钱，这个文库本却只要一角五分就够了，多便宜呀！”我感到站在我身旁的这位服装整洁的店员，好像并不是一个商人，倒像一个相熟的同学或朋友。我向他付了钱，这时他才像个店员似的，向